

中华经典藏书

陈桐生 译注

# 曾子 思子



中華書局

中华经典藏书

陈桐生译注

# 曾子思子



中华书局



# 前 言

在孔门七十子中，曾参是对中国后代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学者，也是散文成就最高的作家。孔门弟子按其入学先后分为“先进”与“后进”，曾参属于孔门的“后进”弟子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记载曾参事迹仅有寥寥数语：“曾参，南武城（今山东嘉祥县）人，字子舆。少孔子四十六岁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，故授之业。作《孝经》。死于鲁。”据学者考证，曾参大约生于公元前505年，死于公元前432年，享年73岁，这在孔门七十子中属于享年较高的人。曾参的父亲是曾点，父子二人俱师事孔子。曾点留下的事迹较少，《论语·先进》载孔子让冉有、子路、公西华、曾点各言其志，冉有、子路、公西华皆志在国相，而曾点独以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为人生志向，获得孔子“吾与点也”的赞许。从曾点的志向来看，他是一个闲云野鹤式的散淡人物，与儒家一贯倡导的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取向不尽相同。《礼记·檀弓下》载季武子卒，曾点倚其门而歌，如此则曾点颇有玩世不恭之意，不过对这条材料的真实性，阎若璩《四书释地又续》力辩其非。曾点本人活得恬淡潇洒，但他对其子却极为严厉，据《孔子家语》、《韩诗外传》、《说苑》等文献记载，曾参耘瓜误断其根，曾

点便以大棒将曾参打昏。曾参并没有仇恨父亲，他从昏迷中醒来之后，第一件事便是安慰父亲。孔子得知此事后批评曾参，认为曾参在父亲盛怒之际应该暂时逃避，以免父亲蒙受笞杀其子的恶名。曾氏父子的故事可能是中国传统教育古训“棍棒下面出孝子”的依据。曾参何时进入孔门，已不可详考，《孔丛子·居卫》载曾参随孔子游于诸侯，这意味着曾参可能是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入学的，钱穆先生《先秦诸子系年》认为，曾参是在公元前489年孔子从陈蔡返卫时进入孔门，这一年曾参17岁。他在孔子门下大约学了十年，孔子死时，曾参年仅27岁，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，曾参便独立地走完学术道路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说，孔子死后，子夏、子张、子游以为有若言行像夫子，便欲立有子为师，曾参表示坚决反对。关于曾参的生平事迹，先秦两汉文献中有一些零星的记载。《韩诗外传》说，曾参在父亲曾点去世以后，曾经仕于莒，又先后为齐相和楚令尹。钱穆先生《先秦诸子系年》指出，据《礼记·檀弓上》关于曾参换席而死的记载，曾参死时还只是士，故《韩诗外传》之说实不足信。曾参一生业绩主要是讲学授徒，传播并发展孔子学说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记载了曾参一个小故事：“曾子居武城，有越寇。或曰：‘寇至，盍去诸？’曰：‘无寓人于我室，毁伤其薪木。’寇退，则曰：‘修我墙屋，我将反。’寇退，曾子反。左右曰：‘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！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，寇退则反，殆于不可！’沈犹行曰：‘是非汝所知也！昔沈犹有负刍之祸，从先生者七十人，未有与焉。’”曾参在越寇到来

之际逃离武城，这一做法引起弟子批评，沈犹行为之辩解，说曾参处于师宾之位，不能要求他负守城之责。关于曾参之死，《论语·泰伯》有一条记载：“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‘启予足！启予手！《诗》云：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！小子！’”曾参按照爱护身体发肤的孝义，一辈子都在小心翼翼地看护自己的身体，直到生命最后一息，他才有如释重负之感，觉得自己可以带着一个完好无缺的身体去见地下父母了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也有一条记载：“曾子寝疾，病。乐正子春坐于床下，曾元、曾申坐于足，童子隅坐而执烛。童子曰：‘华而晬，大夫之箒与？’子春曰：‘止！’曾子闻之，瞿然曰：‘呼？’曰：‘华而晬，大夫之箒与？’曾子曰：‘然。斯季孙之赐也，我未之能易也。元，起易箒。’曾元曰：‘夫子之病革矣，不可以变。幸而至于旦，请敬易之。’曾子曰：‘尔之爱我也不如彼。君子之爱人也以德，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。吾何求哉？吾得正而毙焉，斯已矣。’举扶而易之，反席未安而没。”这是发生在曾参弥留之际的故事：曾参的身份是士，而他睡的却是大夫才能睡的华丽竹席。曾参弟子乐正子春和儿子曾元、曾申不忍心打扰这位奄奄一息的老人，稚气的执烛童子向曾子指出了这一点，曾子一定要儿子换上士的竹席之后，才安然地合上双眼而辞世。曾参换席的故事为“礼不逾节”做了一个生动的诠释。这两条记载表明，曾参将践履礼义坚持到了生命的终点。

曾参不在孔门十哲之内，《论语·先进》有“参也鲁”之说，“鲁”，意为迟钝。这个略带负面意义的评价说明，

曾参一开始在孔门并不出众。但曾参也有超越同门之处，这就是他的情商很高，个性坚韧稳定，体验深刻持久，心怀诚笃，以道自任，终其一生，都在真诚地信仰孔子学说，专心不二地钻研孔子思想，继承并发展师说。《大戴礼记·卫将军文子》载子贡评价曾参：“满而不满，实如虚，通之如不及，先生难之；不学其貌，竟其德，敦其言；于人也无所不信，其桥大人也？常以皓皓，是以眉寿，是曾参之行也。”这是说曾参始终保持不自满的心态，他本来已经受业身通，但却谦虚得像不能把握孔子学说一样，因此孔子以为他难能可贵。他习礼并不是停留在礼文之上，而是努力培养内在的敦厚、诚信等道德品质。所以他能够高明广大，言行高洁，而这些都预示着他将来的长寿。就是依靠这种坚韧、持久、诚笃的品质，曾参最终能够超轶同门，成为七十子后学之中文化学术成就最大的学者。

曾参一系是孔子身后影响较大的一派，《孟子·离娄下》载曾参有弟子七十人。其子曾申、曾元、曾华见于《礼记》，都是儒家著名学者，长子曾申与乃父一样被人称为“曾子”。此外，见于文献的曾参著名弟子尚有乐正子春、单居离、公明仪、公明高、公明宣、子襄、阳肤、沈犹行等人，这些弟子大都是致力于道德文章的诚笃学者。宋儒认为，战国前期儒家重要学者子思也是出于曾参门下。先秦思想家的影响和地位往往与他们的弟子后学素质及其志向有关，曾参之所以能够在七十子中后来居上，超轶群贤，就是因为他的弟子门生辛勤地记录、传播、发展他

的思想学说。

曾参的思想建树首先体现在他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孝道学说。孝的观念在中国出现甚早，殷周金文、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中都有不少孝的论述。孝是孔子教育弟子的重要道德观念，《论语》中载有孔子多条论孝言论。受孔子影响，曾参毕生都在思考关于孝的理论问题，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孝道，由此他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孝子，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孝道理论家。他留下的论孝文章有《孝经》、《曾子本孝》、《曾子立孝》、《曾子大孝》、《曾子事父母》等。其中《孝经》是阐述孝道最为详尽、最有系统的文章。《孝经》被称为“百行之宗，五教之要”（邢昺《孝经注疏序》），它的精义主要有三点：首先，《孝经》明确地提出了“夫孝，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”的孝义三段论；其次，《孝经》依次论述了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、士、庶人五个社会层次应该履行的孝道责任义务；第三，《孝经》提出了“明王之以孝治天下”的治国思路。《孝经》最初不过是战国秦汉时代数百种礼义文献之一，但它最终却从众多礼学传记中脱颖而出，成为独立的一部儒家经典，这其中的原因，就在于它精辟地阐述了孝道的精义。《大戴礼记》所载曾参论孝的文章，大体上都是《孝经》思想的展开与具体化。《曾子本孝》认为“忠”是孝之根本，这个“忠”意思为敬，就是说君子应该以虔诚敬畏的态度来践履孝义。《曾子立孝》进一步提出：“君子立孝，其忠之用，礼之贵。”卢辩注云：“有忠与礼，孝道立。”《曾子大孝》将孝分为三等：“大孝尊亲，其次不辱，其下能养。”《曾子事父母》

指出,事父母之道在于“爱而敬”,事兄之道是“尊事之以为己望也,兄事之不遗其言”,使弟之道是“嘉事不失时”。这些都是曾参论孝的经典言论。

曾参的另一思想建树是继孔子之后提出了反身内省的品德修养思路。《论语·学而》载曾子曰:“吾日三省吾身: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传不习乎?”曾参说他每天都要多次深刻反省自己,是否对人做到了忠信,是否温习了学业。通过深入持久的内在反省,曾参确立了以落实仁学为己任的承担精神,培养了一种博大、深沉、坚毅的人格。《论语·泰伯》载曾子曰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”同篇又载曾子曰:“可以托六尺之孤,可以寄百里之命,临大节而不可夺也,君子人与?君子人也!”这是一种经过长期内德修养而炼成的撼山易、夺大节难的坚毅与果敢,是一种贫贱不能移、富贵不能淫、威武不能屈的品格,是一种充塞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,是一种壁立千仞的精神。被宋儒视为曾参作品《大学》提出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从伦理到政治的人生发展思路,被中国封建时代文人奉为人生圭臬。子思、孟子等人就是在曾子反身内省思想的基础之上,提出“诚”的概念,进一步发展了心性道德学说。

在中国历史上,曾参的思想价值有两次被发现:第一次是在汉代,《孝经》以孝治天下的思路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同,汉家将这一思想运用到治国之中,汉代皇帝谥号前都要加一“孝”字,诸如孝惠、孝文、孝景、孝武等等。第

二次是在宋代，宋儒在孔门七十子中独推曾参，认为曾参继承了孔子的道统，他们将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断为曾参的作品，并认为子思述曾参之旨而作《中庸》，由此开列出“孔子——曾子——子思——孟子”的道统体系，以《论语》（孔子）、《大学》（曾子）、《中庸》（子思）、《孟子》（孟子）为“四书”。近现代以来的新儒家接着宋明理学讲，曾参学说继续得到足够的重视。

曾参在先秦说理散文发展史上也有重要地位。孔门礼学散文的艺术源头是《尚书》、《国语》中的历史记言文，这些文章大都采用历史记言散文常用的对话问答体形式。曾参的一部分文章如《孝经》、《曾子问》、《主言》、《曾子天圆》、《曾子疾病》等也是对话体文章。但他另一部分文章——如《大戴礼记·曾子大孝》、《曾子制言下》、《礼记·大学》等——形式值得充分注意，因为这些文章不再用对话体，而是以一个“曾子曰”领起，全文都是论述文字。这是中国最早的没有叙事框架的纯粹说理散文。我们可以说，中国典型的专题说理散文，是在曾参时代出现的。

曾子是孔门七十子后学中留下文章较多的作家，他的门人后学将其著作编为《曾子》一书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曾子》十八篇。这十八篇《曾子》佚于何时，已不可知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《曾子》二卷，目一卷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《曾子》二卷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《曾子》二卷十篇，称即唐志所载。据高似孙《子略》称，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的

《曾子》与大小戴《礼记》收录的曾参文章已经没有差别。这说明唐代的《曾子》已经不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《曾子》原本。今天我们见到的《曾子全书》是宋人汪晫所编。汪晫是安徽绩溪人，一辈子没有做官，他的一生学术业绩就是编了《曾子全书》和《子思子全书》。汪氏编辑《曾子全书》的方法，是将《孝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大戴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孔子家语》、《孔丛子》、《韩诗外传》、《说苑》等先秦两汉古籍中有关曾子的文献材料收集在一起，重立篇题，划分章节，重新编定各章次序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对汪晫所编《曾子全书》有“自我作古”之讥，但又称“过而存之，犹愈于过而废之”，就是说汪氏所编《曾子全书》仍有保留价值。《曾子全书》共十二章，分为内篇和外篇，其中外篇第七、第八已经亡佚，今存十章。

孔伋，字子思，是孔子之孙，孔鲤之子，在年辈上属于孔子的再传弟子。孔鲤死在孔子之前，一生在政治和学术上都没有什么建树，而子思则是战国前期儒家一大重镇，也是孔子后人中一大思想家。子思大约生于公元前483年，死于公元前402年。郑玄根据《礼记·檀弓上》子思哭嫂为位的记载，而推测子思并非孔鲤嫡子。这位不知名的子思兄长大约去世较早，子思因此成为孔子唯一的孙子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对子思的生平有简短的记载：“伯鱼生伋，字子思，年六十二（或为“八十二”之误——作者注）。尝困于宋。子思作《中庸》。”

《史记》所说的困于宋，发生在子思少年时代。据《孔

丛子·居卫》记载，子思 16 岁那年到宋国，宋大夫乐朔与子思讨论学问。乐朔批评《尚书》中的商周之书“故作难知之辞”，子思年少气盛，出言不逊，讽刺乐朔是“委巷之人”。乐朔本想与圣人之后讨论《尚书》语言问题，却无端受到子思侮辱，于是率众围攻子思，幸赖宋君出面相救，子思才得以脱险。困宋的经历使子思发愤述作，反而成就了他的学术事业。

子思与鲁缪公的关系是他生平又一重要悬案。汉人以为子思为鲁缪公之师，这个说法在《孟子》一书中已露端倪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载：“缪公亟见于子思，曰：‘古千乘之国以友士，何如？’子思不悦，曰：‘古之人有言曰，事之云乎，岂曰友之云乎？’子思之不悦也，岂不曰：‘以位，则子，君也，我，臣也；何敢与君友也？以德，则子事我者也，奚可以与我友？’”鲁缪公自以为身为千乘之君，放下身段与子思以朋友相交，子思应该心满意足了，谁知子思心里想的是“子事我”，就是说子思理想中的与鲁缪公关系是师徒而非朋友。在战国时代，为王者师，是许多士人共同的人生理想，像子思这样以道德学术傲视诸侯的一代名士，渴望为王者师是很自然的事情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又载孟子曰：“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，则不能安子思。”《孟子·万章下》曰：“缪公之于子思，亟问，亟馈鼎肉，子思不悦，于卒也，搢使者出诸大门之外，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，曰：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。”这条材料是说鲁缪公专门派人慰问、服侍子思，馈送子思鼎肉，但子思所需要的不是物质享受，而是精神上的尊重。据《礼记·檀

弓下》记载，鲁缪公曾经向子思请教丧服之礼。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篇《鲁穆公（即缪公）问子思》，记载鲁缪公问子思何为忠臣，子思说，经常指出君主过错的人才是忠臣。以上材料表明，鲁缪公确实尊敬子思，并且向子思请教过一些问题，但很难确指子思为鲁缪公师。钱穆《先秦诸子系年》指出，鲁缪公元年在周威烈王十一年，上距孔子之卒已有64年之久，如果子思年寿为六十二，那么子思绝无可能赶上鲁缪公时代。有人认为“六十二”是“八十二”之误，这样子思与鲁缪公就有交集的时间。也有人认为，《史记》“六十二”之说不误，子思与鲁缪公的交往是在鲁缪公尚为太子之时。可能是子思晚年由卫、宋返鲁，受到鲁缪公的礼遇。战国诸侯贵族尊礼贤士，本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，当时所谓为王者师，充其量是受到礼遇而已，不可当真，与那种正规的师徒有很大差别。汉人在战国人说法基础上添枝加叶，遂把子思说成是鲁缪公之师。

子思的学术渊源也是学术界历来关注的问题。《史记》和孔门礼学文献都没有关于子思师承的记载。到了唐宋时代，一些学者提出子思学于曾参。韩愈在《送王秀才序》一文中说：“孟轲师子思，子思之学盖出于曾子。”二程说：“孔子没，曾子之道日益光大。孔子没，传孔子之道者，曾子而已。曾子传之子思，子思传之孟子，孟子死，不得其传，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。”（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十五）宋儒言之凿凿，编制了孔子——曾子——子思——孟子一脉相承的道统体系。从先秦文献

来看，子思与曾参确曾相识并有交往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载曾子曰：“子思之哭嫂也为位，妇人倡踊。”这是曾参以子思哭嫂为执小功丧礼范例。同篇又载：“曾子谓子思曰：‘伋！吾执亲之丧也，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。’子思曰：‘先王之制礼也，过之者俯而就之，不至焉跂而及之。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，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，杖而后能起。’”子思在此委婉地批评曾参执亲之丧逾礼，如果是师徒，那么这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《孔丛子·居卫》载：“曾子谓子思曰：‘昔者吾从夫子游于诸侯，夫子未尝失人臣之礼，而犹圣道不行。今吾观子有傲世主之心，无乃不容乎？’子思曰：‘时移世异，各有宜也。当吾先君，周制虽毁，君臣固位，上下相持若一体然。夫欲行其道，不执礼以求之，则不能入也。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，竞招英雄以自辅翼，此乃得士则昌、失士则凶之秋也。伋于此时不自高，人将下吾；不自贵，人将贱吾。舜禹揖让，汤武用师，非故相诡，乃各时也。’”曾子称子思为“吾子”，批评子思有傲世主之心，而子思则表示要我行我素，丝毫不接受曾子忠告之意，如果子思真的学于曾子，那么子思决不会对曾子采取如此态度。以此看来，子思学于曾参之说实不可信。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将思孟学派上溯到孔子和子游，康有为、郭沫若等人遂以为子思之学出于子游，此说目前还缺乏有力证据。那么，子思之师究竟是谁呢？子思虽然在辈分上属于孔门第二代弟子，但他是特殊的孔门后学，因为他是孔子之孙，不仅有机会亲炙于孔子，而且从小就混迹于孔门七十子之中。《孔丛子·记问》记载

了三条子思问孔子的材料,《孔丛子·居卫》载子思“吾闻诸子夏”之说,此外子思也提及子游。子思在这个圣贤环境中长期耳濡目染,终于成就为一代大儒。

子思是一个具有强烈个性色彩的文人。他说话不留情面,犀利尖刻,火气十足,架子很大。他以道德才能傲世,高扬士人不屈的气节,伸张独立的人格,时刻捍卫自己的尊严。在这些方面,他不仅有别于他的爷爷孔子,而且不同于他的学术前辈七十子,倒是与他的同辈段干木、田子方等人立身行事方式颇有相似之处,堪称是得时代风气之先的新潮人士。这其中的原因,实在是时代使然。孔子时代,士文化思潮尚在酝酿阶段,当时支配孔子和七十子言行的主要是西周和春秋的礼义,而到了子思时代,战国士文化思潮正在兴起,一种以道德、才能、义气抗衡财富爵位的新的价值观正在形成,子思深深感到,士人扬眉吐气的历史时刻到了,因此才有他的傲世、骄世之举。当时有一些好心人劝告子思随顺世俗,《孔丛子·公仪》载:“胡毋豹谓子思曰:‘子好大,世莫能容子也。盖亦随时乎?’子思曰:‘大非所病,所病不大也。凡所以求容于世,为行道也。毁道以求容,道何行焉?大不见容,命也。毁大而求容,罪也。吾弗改矣。’”此处的“大”,既是指子思追求的境界大,气魄大,也是指子思架子大,脾气大。子思坚决不愿毁大以求容,而宁愿求大以行道。

子思是战国前期儒家代表人物,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,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子思作品有不同的取舍。战国时期,学术界重视的是子思论述五行的作品,学

者们将子思与孟子合称思孟。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说：“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，犹然而材剧志大，闻见杂博，案往旧造说，谓之五行，甚僻违而无类，幽隐而无说，闭约而无解，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：此真先君子之言也。子思唱之，孟轲和之，世俗之沟犹瞽儒，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，遂受而传之，以为仲尼、子游为兹厚于后世。是则子思、孟轲之罪也。”按此说法，“五行”是思孟学派的核心思想。不过这个“五行”不是阴阳五行学派所说的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庞朴先生说，“行”读音为“héng”，“五行”指的是仁、义、礼、智、圣五种德行。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甲本卷后有一种古佚书，篇中论述仁、义、礼、智、圣五种德行，后面附有世子所作的传，整理者因此将这篇古佚书定名为《五行》。二十世纪末，《五行》又重见于郭店竹简，与帛书《五行》相比，它有经无传。《五行》强调道德的内在性和道德的形上性，与子思一贯倡导的内德修养是一致的。

到了宋代，以道德心性学说为核心内容的新儒学兴起，子思的另一篇代表作《中庸》因此受到特殊重视，被朱熹列为“四书”之一。《中庸》一开始提出了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的著名命题，将天道与人道结合起来。作者认为要践履中庸之道，就要处理好五达道即君臣、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朋友五种人际关系，履行智、仁、勇三达德，还要贯彻修养自身、尊重贤人、爱护亲族、敬重大臣、体恤众臣、爱护百姓、劝勉各种工匠、优待远方的客人、安抚诸侯这九经。慎独自修、忠恕宽容、至诚尽性则是实行中庸之道的几项主要原则。《中庸》是儒家

论述心性道德培养的重要作品，被宋儒说成是“孔门传授心法”之作。

《孔丛子·居卫》载子思的著作有四十九篇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诸子略儒家类著录《子思子》二十三篇。汉志著录的《子思子》已经亡佚，因此我们无法看到子思文章的全貌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，今本《礼记》中的《坊记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表記》、《缁衣》四篇出自《子思子》。郭店竹简中除《缁衣》外，尚有《五行》、《鲁穆公问子思》竹书，论者以为是子思著作。我们今天所读到的《子思子全书》，系宋人汪晫所编，他编辑《子思子全书》的方法与《曾子全书》相同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对此已有考辨。汪晫无由见到《五行》、《鲁穆公问子思》等文章，这是《子思子全书》的缺憾。

本书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“诸子百家丛书”中的汪晫所编《曾子全书》、《子思子全书》为底本，酌参大小戴《礼记》及其他先秦两汉古籍，注释、译文则参考《十三经注疏》等古籍中的相关篇章。注译古籍虽被世人视为小道末技，难入大家法眼，但涉足其间就会知道，此事容不得有半点含糊，往往会因为一个字斟酌踌躇，去翻检许多材料。由于我学力不够，在译注过程中可能会有不少失误，亟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又：孔子到子思的时代，《诗》、《书》还未被尊称为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，但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理解，还是将正文中的《诗》、《书》直接译成了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。将此说明。